

詩的南方：時代變革下的離散文學現場

高嘉謙*

一、一個南方的視點

《遺民、疆界與現代性：漢詩的南方離散與抒情（1895-1945）》關注十九世紀末至二戰時期，在中國南方、臺灣、香港與南洋的詩人群體的離散際遇。從他們寫於境外的漢詩，探究一個政治／文化遺民的精神處境，思辨漢詩文類寄寓士人文化心靈的現代意義。我們觀照詩人跨境南方的遺民書寫與漢詩實踐，在區域流動、新民維新的視野內，凸顯種種思辨殖民、疆界、現代性之文學策略。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從臺灣、廣東到香港；從新加坡、馬來半島到蘇門答臘，此書試圖呈現一代流亡知識分子銘刻歷史嬗變，見證家國離散的文學實踐。這是近代文學研究值得重視的議題，突出變局下的傳統文人在東亞和東南亞的跨境流動，以及其衍生的漢詩能量。此書形塑的南方離散詩學景觀，希望藉此帶動近代文學和華語文學研究的新趨勢。

二、寫作的緣起

近代鼎革經驗下的中國、臺灣及南洋知識分子，他們流動和離散經驗不在少數。當我們聚焦文化遺民的漢詩寫作，尤其可以重新探討和觀察，漢詩類型在 20 世紀的發展脈絡和意義。從乙未割臺、辛亥革命，以迄抗戰風潮，知識分子的跨境遷徙，同時帶動了知識轉型與經驗結構的變遷。無論是使節、政治遺民或新興知識人，他們的跨境寫作，往往是我們思辨和觀察漢詩如何表徵社會與文化意義，展現詩的現代功能的重要脈絡。境外流動涉及視域的改變，無論是海洋經驗、殖民地、城市空間、文化衝擊、離散際遇、雙鄉體驗、知識體系、民族和語言的裂變及融合，漢詩在 19 世紀至 20 世紀的現代鉅變中，依然是士人寄託情志，隱喻胸懷的重要文類，這深化了我們重新理解這個古典文類遭遇的現代元素刺激，可能的改變與不變。在動盪時代，士人際遇游離於傳統與現代的裂變，無論價值、信仰和世界觀，都面臨必要的妥協或轉型，因此對傳統文化與生活價值抱有眷戀的知識人，容易在政治立場，以及文化與身分認同顯現一種文化遺民的特質。在此基礎上，我們觀察乙未割臺後的臺灣，辛亥革命後的香港，以及從十九世紀以降就遍布華工、流亡政客及知識人的南洋，那已是化外之地的炎荒絕域。這些南方世界，恰恰構成了我們觀察漢詩，描繪文人移動，以及各地文學發展生態的關鍵起點。

以下針對南方世界的文人遷徙與漢詩播遷，提出幾個個案的介紹和分析，藉此勾勒我們對南方漢詩世界的認識。

三、漢詩「下南洋」¹

十九世紀末以降，士大夫與平民百姓的跨境出國已成常態，尤其以謀生為主的群體遷徙，華工的跨境出洋，說明晚清以來的中國正進入大離散的時代氛

¹ 以下段落，部分援引自筆者拙作〈漢詩「下南洋」〉，收入高嘉謙、鄭毓瑜編《文學·經典·現代意識》（臺北，麥田出版公司，2014），頁 318-337。

圍。在此脈絡下重新討論詩的寫作，除了凸顯詩的境外書寫已成為遷徙者在流動過程中極為重要的文學實踐，同時亦清晰勾勒出中國精粹的傳統文學形式，必然遭遇海外異質世界與文明體驗，從而衍生文類形式的守成與改造，以及修辭手段與內容表徵的思考。如此一個遷徙流動的情境，一個主動與被迫的現代境遇，無形中預告了傳統文人最熟悉的古典詩詞寫作，進入到一個現代情境世界的書寫。

我們以漢詩命名這類境外書寫的舊體詩歌，除了兼具域外漢字文化圈的古典詩詞寫作傳統，同時凸顯世紀交替的境外漢詩具有詩界革命倡導的「新意境、新語言、舊風格」的寫作趨向，多有音譯新詞新語入詩現象，漢詩更接近現代情境下的境外寫作與離散狀態——不在中國，既有漢語的文化想像，亦有漢語的表述邊界和語言混雜現象的實驗及思考。

從族裔遷徙和離散敘事的角度而言，「下南洋」或「南來」表現了中國南方在境外的經濟與勞力流動，並象徵一個值得探究的文化與文學播遷的地理軌跡。中國使節和文人的南來形塑了早期新馬地區的文學生產，其中以漢詩寫作規模最為可觀。這些知識分子的南來凸顯士大夫階層的境外離散和文化播遷，尤其部分南來文人兼具詩人和政治身分，他們流寓南洋期間的文化影響和文學實踐，都直接或間接形塑了我們理解殖民地時期新馬最初的文學風貌。從左秉隆、黃遵憲、楊雲史、康有為、丘逢甲、梁啟超、邱菽園、陳寶琛，甚至二戰時期的郁達夫等外交官和詩人的南來，我們注意到了南方的漢詩譜系精彩的一面。而報刊、文社的普及，由晚清延續到戰後，不曾中斷且散落報刊的無數漢詩和默默無聞的詩人，更說明了不容小覷的漢詩生產規模。漢詩形塑的海洋意象、中華帝國及其周邊國家的朝貢貿易歷史和世界體系的變革、離散華人社會的脈動、中華教化與文化傳播、認同與鄉愁、殖民地體驗，以及近代中國的地理、外交、政經延伸的家國危機，成為別具面貌的境外漢詩特色，理應構成辯證東亞漢詩體系的新視角。尤其漢詩的生產不但構成了華人移民文學的早期發展型態，且銘刻南來的遷徙情境和移民的落地生根。截至廿一世紀的今天，漢詩始終未絕跡於新馬地區，象徵了南來脈絡的馬華文學生態中，持續性的對民族文化和審美意涵上文化共同體的想像。

南來文人對馬華文學別具意義，當然屬於離散文學的重要個案，間接也指出南來作為一個遷徙流動的地理概念，實際已是一個文學地理的觀察。馬華離散漢詩因而是討論馬華文學的起源與發展，最初且關鍵的文本。這提醒我們關注殖民地時期的馬來亞華人移民社會，以及其文學生產機制，同時提出對馬華文學史書寫長期以新文學為起點的反思和辯證。

當我們回顧馬華古典漢詩群體的組成脈絡，探討十九世紀末的南來作者形成的文學社群和建制，以及他們筆下的南洋書寫，那已是一個漢詩「下南洋」的現象。在馬華文學的系統內，漢詩既勾勒出別具意義的文學地理和離散敘事，也凸顯了馬華文學最初的越境，以及漢詩與現代性的辯證。

我們藉由詩人筆下理解他們表徵現代情境下瞬間震懾的存在感、時間的急迫和文化斷層的擠壓，一一浮現為詩的內容，以致地理的遷徙、流亡，變成詩寫入時代的重要姿態。因此漢詩的古典意象在越境寫作裡，難免構成抵擋現代時間風暴的隱喻式書寫，相對帶有一種文化的審美意味。

但漢詩的現代性思考，不僅是新派詩意義下的新詞彙、新概念，而是現代性意識如何具體落在「滑動覆疊」的異元素變革與轉換。因此漢詩在遷徙流動中的空間、疆界思索，以及對城鄉地景、自然景觀、文化空間和生存體驗的描述，具體辯證了詩人在南洋的存在方式與自我認知，因而形塑馬華的漢詩風土。換言之，我們對漢詩「下南洋」的思考，不僅是設邊立界的國土疆域，尚且觸及語言系統的變換與人的生存位置與想像，呈現文體與疆界的交織和聯繫。

四、孔教與漢詩的流亡

1900年兩位晚清嶺南的著名詩家康有為與丘逢甲南來，替南洋漢詩形塑了迥異的風貌。丘逢甲（1864-1912）是從臺灣內渡廣東的抗日詩人，康有為（1858-1927）是戊戌政變後流亡海外的逋臣，兩位名人為孤懸海外的新加坡島，帶來了巨大的文化光環及文教氣息。丘逢甲在抵達新加坡以前，他的百餘首詩作和文章經由當地文人邱菽園在報刊的登載與傳播，丘逢甲的名氣、光環與辦學志向早已滲入當地知識階層的紳商之間。此次南來還前往馬來半島，印尼各地演講與拜訪。整趟旅程由此定調為一趟宣揚辦教育創學堂宗旨的文教行旅，發表多篇倡導創建孔廟學堂的文章，鼓勵了當地的孔教運動。當地華人的熱烈響應和推崇，讓丘逢甲感到意氣風發的自豪，可從兩首〈自題南洋行教圖〉的氣勢來看：

莽莽群山海氣青，華風遠被到南溟，萬人圍坐齊傾耳，椰子林中說聖經。
二千五百餘年後，浮海居然道可行。獨倚斗南樓上望，春風迴處此瀾生。（〈自題南洋行教圖〉）

詩裡盡現熱烈的排場，展示一種文化自足。恰是這種萬人聽教的場景，激動詩人飄零枯竭的心境，彷彿找到了異域漢學復興的契機。丘逢甲終於在自我

建構的漢詩與文教空間裡窺見理想，渡海實踐詩與文的寄託。從保教保種到興學，當地移民所追求文化身分的安頓與確立，振興丘逢甲的教育事業，也牽動了孔教播遷的文化地理。

同年，流亡中的康有為接受了邱菽園的邀請，從香港來到新加坡避難，開始他在新馬地區的流亡生活。作為戊戌政變的出亡者，他前後出入新馬的次數要比晚清其他流寓南洋的文人更多，留居時間相對也長。他在南洋創作生產的漢詩，足以組成他已出版詩集的三卷。這階段的漢詩內涵，基本籠罩著一種深沉的創傷意識與帝國想像。戊戌變法時他走在帝國前端，變法失敗後他走在帝國境外，他自詡為帝國維新之師，卻又只能在絕域流離喟嘆。他驚恐無奈與忐忑不安的壯志抱負，在詩裡化成一股鬱結的氣象：

天荒地老哀龍戰，去國離家又歲終。
起視北辰星暗暗，徒圖南溟夜濛濛。
亂雲遙接中原氣，黑浪驚回大海風。
腸斷胡琴歌變徵，怒濤竟夕打艨艟。

（〈己亥十二月廿七日，偕梁鐵君、同富侄、湯覺頓赴星坡，漁舟除夕，聽西女鼓琴。時有偽嗣之變，震蕩余懷，君國身世，憂心慘慘，百感咸集〉）

他將流亡狀態以詩賦形，同時「記史」。從宮廷鬥爭聯想海天塌陷，海路所見都是聳動意象——天荒地老、星暗暗、夜濛濛、亂雲、黑浪，排山倒海的壓迫感，早已置個人於流亡的大潮。詩的氣勢磅礴，筆力驚人，鋪張典故寄寓複雜的中原想像。儘管去國離家久遠，帝國的流亡者並沒有偏離核心，「北辰星暗暗」和「南溟夜濛濛」清楚對照君臣之間的距離和處境。他的君國情感，塑造了獨特的流亡文化地理。

當他避居馬來半島的森美蘭和馬六甲兩州邊境的丹將敦島（Tanjung Tuan），在海邊拾木之際，依然展示了驚人的巨大歷史志向。

斷木輪囷棄海濱，波濤飄泊更嶙峋。他時或作木居士，後萬千年尚有神。（〈丹將敦島拾古木甚嶙峋，題詩其上〉）

他從棄置的古木想像有朝一日可以刻成木頭偶像，在千萬年後供人膜拜的神靈。這當中曝顯了他對功業與自我學說的不朽追求，甚至隱含一種宗教性質的「教主」渴望。他十九歲鄉試落第，拜服孔聖，發憤讀書之際，早有「以聖賢為必可期」的抱負。民國以後宣揚「尊孔」為立國精神，更直言「吾少嘗欲自為教主矣」，強調要在孔子之外自為教主的原始慾望，因無法攻破其學問轉而尊孔。

亡命之時，他的「教主」情懷，隱然牽動了他在南洋宣揚和發起的孔教運動。

在此期間，康有為作為中國孔教運動創始者的光環，自然對南洋的華人興學產生巨大效應。他在各地宣揚中華文化，鼓勵華僑興學，卻成功推動新馬和印尼新式華人教育的誕生。這是南來知識分子浪漫的詩學想像，也含有傳播孔教的使命與熱情。他們作為華人文化教育的精神指導，建設了南洋早期華教的格局和規模。可以確認的是，康有為親身參與了新加坡華人女子學校和馬來亞尊孔中學的設立，如同他在詩裡的激昂表述：「與君北灑堯台涕，剩我南題孔廟碑」。因為戊戌出亡，讓他有了在南洋建樹文教的機會。箇中悲涼的情調，藏有流亡心思，卻精確描述了華僑社會文化教育的現實。

康有為由「王者師」變成亡命逋臣，絕域反而形成詩的生產條件，他的感觸尤其深刻。因此他遊歷爪哇，就忍不住高歌：「中華士夫誰到此，我是開宗第一章」（〈遊爪哇雜詠〉）。他有「史上第一人」的新奇與使命，顯然已自覺的意識到流亡背後具體的現代地理經驗，已非傳統的流放與避地可以比擬。

五、移居與地方感

相對短期過境或流寓的文人，以「星洲寓公」自詡而終老於新加坡的邱菽園（1874-1941），一生為馬華文學留下一千餘首詩作。他有「南僑詩宗」之譽，也是康有為、丘逢甲眼中最具才華的南來詩人，前後出版了四部詩集，其中《嘯虹生詩鈔》（1922）、《邱菽園居士詩集》（1949）最廣為人知。1896年23歲的邱菽園移居星洲繼承父親龐大遺產，投入當地文教建設和鼓吹風雅。他創辦麗澤社，提供和鼓勵了當地文士才人進行文藝創作和投稿的機會，開啟他在當地的影響力。當時麗澤社在報刊公開徵稿的星洲雜詠詩題，就有「星洲竹枝詞」、「粵謳題」。在星洲雜錄部分，不限散文駢體詩詞，題目都跟當地生活場景相關如「打球場、旌旗山、博物院、自來水匯、公家花園」等。以民間歌謠和竹枝詞形式，擷取當地題材，邱在南來初期已建立自己的在地視域和眼光。值得注意的是，他以馬來語和英語入詩寫作的「星洲竹枝詞」，不是實踐詩界革命強調的「新語言」，而是南來文人以舊詩形式貼近當地語言的文學戲仿，透過詩語的轉換和轉譯，遊走文／體的疆界，形塑竹枝詞的在地趣味與地方感。

此外，他創辦《天南新報》（1898-1905）、承頂《振南日報》（後易名《振南報》）（1913-1920）參與中國境內的政治議題，接濟政治流亡者康有為、容闈、梁啟超等，資助庚子勤王。同時聯繫當地土生華人開辦女子學堂，推動新馬地區的孔教運動。邱菽園以文人品味及文化資本積累而成的文學空間，最大的意

義在於建構了一個中國、臺灣、香港與南洋區域之間的漢詩人交遊的網絡。他透過宴飲酬唱、詩文互通的疊錯網絡，呈現文人在新舊交替的時代感受。他收集和出版流寓文人作品，藉由公共資源，召喚和描繪一個離散的文學想像，為大時代中短暫易逝的流離感受，以及境外漢詩的生產環境，保留一個南方的文學譜系。

邱菽園詩集裡留有不少以「星洲」命名的詩篇。他著眼南洋地域的生存感覺，寫作風月紀聞、異族婦女的習俗，帶有文人風流雅趣。除了寫作官能風土的遊戲之作，他也特別雜揉南遷歷史脈絡，為星洲找到自身的書寫位置，凸顯出他不同於一般流寓者的眼光。然而更能具體展示漢詩的境外生成意識，還是詩人投入書寫亂離體驗與異地生存的種種文化衝擊和在地生活的關懷。邱菽園曾以清麗淡雅筆觸描寫移居者落地生根的現實情境，無形之中延續了黃遵憲早期「遷流或百年」(〈新嘉坡雜詩十二首〉)的觀察，並進一步從自己的華商身分出發，體驗他鄉遇故知的共鳴。這不但豐富了離散漢詩的鄉土感覺，也拓展流寓者漢詩創作的的基本關懷。

舊雨椰風外，連岡橡葉青。相逢盡華商，移植到南溟。鄉土音無改，人間世幾經。安閒牛背笛，吹出自家聽。(〈移植〉)

造林增野闢，築壩利車行。榛莽卅年易，芳菲百里平。山低無颶患，舟集有潮生。烽火驚鄉夢，僑民漸學耕。(〈島上感事四首〉之一))

透過邱菽園深入觀察南洋地理的人文風貌變遷，漢詩呈現出南洋從炎荒之地，變為建設有成的移民社會。只是末聯一句「烽火驚鄉夢」，讓讀者看到詩人隱藏的情緒張力。移民城市景觀的變化，對照原鄉喪亂動盪。移居者所把握在地感，凸顯在現實的「僑民漸學耕」。他們成了回不了故鄉的廣義遺民，只好在異地重建自身的文化教養。對照前一首的詩題〈移植〉，人的遷徙其實是根的移植。詩的言外之意似在強調：他鄉重逢不是偶然，而是新生活的開始。邱菽園的觀察顯然透澈，這些張揚南洋地方意義和特質的漢詩面目，已非一般流寓者的獵奇目光。所謂詩的地方色彩，在邱菽園身上已深化為在地生活感。

六、華語文學的起點

我們檢視十九末至廿世紀初期的南方離散詩學，透過南下新馬的重要個案的簡要描述，勾勒出新馬漢詩發展的基本譜系，並試圖從南來與南遷的歷史情

境，解析南來在漢文學播遷的視域內，凸顯的文化想像和文學地理，並重新思考馬華文學史置於離散詩學的可能意義，藉此凸顯馬華古典文學在東亞漢詩與漢文學系統內的重要位置。我們透過探究南來漢詩的生產，見證了馬華文學史流動的可能，並為馬華本土性的探勘提供一個歷史縱深的參照。而十九世紀末為起點的馬華離散詩學，理應是我們重新認識馬華文學史的重要開始。